

名家讲解

战国策

【上】

王延栋 / 著

《战国策》主要是战国时期纵横家和智谋之士纵论国事与时势的言论辑录，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妙境界，洋溢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王延栋先生用几十年功夫研究《战国策》，吸收众家之长，多有创获之见。本书校勘精审，注释准确，译文流畅，讲解简明，是研习先秦秦汉文学、上古史的必备书。

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ON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

长春出版社

王延栋 / 著

名家讲解

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ON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

战国策

【上】



前言

《战国策》这部名著，可以说用不着介绍。它跟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书一样，又是历史，又是文学，具有中国文化常识的读者都知道它。它里面的一些故事、寓言等等早已凝结为一些常见的成语，人们从小听故事、看儿童读物总会听见、碰着、用到，只不过不知道出于《战国策》而已。学校的语文课本也选有不少《战国策》篇目。

《战国策》这部名著，也可以说需要认真介绍。要想对《战国策》作一全面的概括性说明、评估，确非易事。在我与张清常先生合著的《战国策笺注》（1993年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）中，先生写过一篇精彩的《前言》，这篇文章以《战国策评估》为题，发表在《南开学报》1993年第3期上，尔后又被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华文摘》部分地转载。面对先生这篇《前言》，让我重起炉灶再写一篇，确实感到有些茫然和束手无策，大有“黔驴技穷”之感。索性以彼《前言》代此《前言》吧，以示对先生的感念和告慰。先生曰：

战国（公元前475年～公元前221年）曾被古人称为“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”（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）。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，也是最丑恶的时代之一；它是人类最高智慧的光辉闪耀夺目的时代之一，也是茫昧愚蠢的时代之一；它是中国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政治法律经济学说、自然科学理论及技术（尤其在冶炼、水利、农业、武器、战备、医学等方面）突飞猛进，文化昌盛的光明季节，也是统治者对人民施加残暴镇压的黑暗季节；它是人类对未来满怀着美好希望，人才辈出的春天，也是二百六十年战祸连绵，千千万万人民遭到屠杀的冬天；它是国王大臣等统治阶级横征暴敛，肆意霸占一切，无恶不作，飞扬跋扈，荒淫奢侈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过着人间天堂生活的日子，也是劳动人民备受欺侮压迫，挨饿受冻，生命毫无保障，贫困到一无所有，过着人间地狱般生活的日子。使人感到惊讶的是：那时代伟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希望仍然鼓舞着现代中国和世界，那时代的污泥浊水至

今仍未涤荡干净。

这二百六十年真是个奇特的时代,这个时代的产物《战国策》也是先秦奇书之一。

《战国策》是古代按国别来编排的史料汇编之一种。编辑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以及一般智谋之士的游说、出谋划策之辞和诡诈权变故事,也是若干重要的战国人物、史实的记载。这类书原有许多种名目和本子:《国策》《国事》《事语》《短长》《长书》《修书》。时代有的下延到楚、汉之际。西汉末年刘向(公元前79年~公元前8年)加以整理定为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。可能刘向把下限放宽,兼收了西汉初蒯通、邹阳等的材料?也可能是后人顾名思义而把战国以后的蒯通等人的材料剔出去?阙疑。

《战国策》的“策”,据《说文》本义是赶马所用的工具,近似马鞭一类的东西,被借为竹片木片简册之“策”。古代的策(册)长二尺四寸(见《仪礼·聘礼》)。一百个字的材料就使用它来写(见伪孔安国《尚书·序》疏)。王国维《简牍检署考》特别提到《战国策》的问题:“窃疑周、秦游士甚重此书。以策书之,故名为《策》;以其札一长一短,故谓之《短长》;比尺籍短书,其简独长,故谓之《长书》《修书》。刘向以‘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’,定其名曰《战国策》,以‘策’为策谋之策,盖已非此书命名之本义。”王氏说基本正确,但“策”作为计谋来使用,已见于《吕氏春秋·简选》“此胜之一策也”。所以后代才会产生:策略、策划、国策、政策、对策、决策、划策、画策、计策、献策、良策、妙策、上策下策、失策、群策群力等。

《战国策》在历代图书目录中,有两种安排:一种是放在史部杂史,一种是放在子部的纵横家。前者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春秋家。唐代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认为《战国策》“其属辞比事,皆不与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相似,盖率尔而作,非史策之正也……备而存之,谓之杂史”。五代《唐书·经籍志》、北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南宋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均如此。另一种安排始于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,认为“历代以其纪诸国事,载于史类。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,难尽信,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,当附于纵横家。”宋、元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列于纵横家,元代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明代《百川书志》同。

在过去,《战国策》一直是既被称赞“其文辨博,有煊而明,有婉而微,有约而

深,太史公之所考本也”(鲍彪《战国策注·序》),又被痛加诋毁的。刘向说《战国策》的内容均非正道,但“亦可喜,皆可观”(《校战国策书录》)。北宋曾巩(1019年~1083年)痛斥战国游说之士,对于《战国策》这种充斥了“邪说”的书采取了“放而绝之”的态度(《战国策目录序》)。元代吴师道在《战国策校注》中评论说:“是书善恶无所是非,而作者又时出所见,不但记载之,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,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,此其最陋者。”(按:《秦一·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》章,苏秦问“嫂,何前倨而后卑也?”嫂答“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。”又《楚一·江乙说于安陵君》章“江乙可谓善谋,安陵君可谓知时矣。”就事论事,前章的描写和后章的评论,没有多大的问题。)明代王廷相抨击《战国策》“摄权变以钩利,蓄狙诈以交外,倖近小以为得,便苟偷以为安。其心隐忍,其事欺谩,其术鄙陋委琐,畔于正轨远矣!而时君闇劣,慑于祸患,一切倾心听之。由是兵戈偏于九域,生民涂其肝脑,古昔圣人休静天下之泽,斩然无存。嗟乎,世变至此及矣!”(《校战国策序》)清朝陆陇其说:“《战国策》一书,大抵皆纵横家言也。其文章之奇,足以悦人耳目,而其机变之巧,足以坏人心术。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,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!”(《三鱼堂文集·〈战国策去毒〉跋》)总之,《战国策》在正统思想的笼罩下,它是难以抬头的。今天,我们应该还给它一个比较切实的评价。

《战国策》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国君与执政者,或者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,以及相互倾轧的阴谋诡计等等。这些,充分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、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。所以《战国策》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之一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就曾采用了它。

《战国策》大量收录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说辞,其中有真有假,有虚有实。这里面包括了后来纵横家追述前辈的游说之辞,或者假托前辈的名义而编造出一些书信与故事传说等。这些不但未必能够符合历史真实,而且所述人物和事迹本身就混乱矛盾,当然也还有若干浮夸之辞,难以置信。例如苏秦,年代弄不清楚,说辞所举历史地理情况与实际多有出入,事迹或与苏代、苏厉搅在一起,《齐三》记载苏秦封武贞君,《燕一》记载苏秦封武安君……。诸如此类,令人怀疑。司马迁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也指出:“然世言苏秦多异,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。”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爬梳史籍,又借助于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,基本上弄清了苏秦的主要情况。可见《战国策》虽有

一些虚拟的东西不能信以为真,有待鉴别,但绝大部分的策文是符合史实的,不可以因噎废食。许慎《说文》,我们对它也会指指点点,说三道四,但幸亏有了它,我们才能比较有些基础来认识甲骨文。同样的道理,如果没有《战国策》的《中山》策文,那么1974年11月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虽被发掘出来,我们的研究工作恐怕就要白手起家了。

从史料研究的角度看,《战国策》可利用的还不少。例如:

一.《战国策》确实写了人世间许多不便于说出口的卑鄙肮脏的事情,尤其是诸侯国政治舞台上面的丑恶现象,极其不堪入目。却写得那么逼真,洗练,甚至使人惊心动魄,看穿了这一群衣冠禽兽,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慨。但卫道之士却抨击此书“坏人心术”,犹如攻击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等海盗海淫一样。试想如果没有《战国策》这样比较集中描述的翔实史料和盘托出当时的历史,我们对于伟大诗人屈原的激愤,对于先秦诸子光辉思想的产生,虽能理解但体会不可能这么切实深刻。

二.《战国策》中写了几个太后:《齐四》有赵威后,《齐六》有君王后,《赵四》有赵太后(是否与赵威后为一,有争议),《秦二》《韩二》等有秦宣太后。每个人都活跃于纸上,确是一国之尊。赵威后和君王后的见解魄力远胜男子,却没有受到应得的赞扬。赵太后大权在手,如果不识大体顾大局,触龙虽有三寸不烂之舌,亦无可奈何。可是一说起此事,便把触龙捧了又捧,夸了又夸,把赵太后降为昏庸老太太;一说到唐太宗发怒而终于纳谏,却不住称赞唐太宗,为何独薄于女而偏厚于男?秦宣太后是最倒霉的,两件事情都被人们用后代压迫束缚女子的眼光讥笑得极为不堪。殊不知战国距离古代母系社会时期毕竟比宋、元近一些,战国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比后代略胜一筹。对于男女间的禁忌也略少一些。《战国策》所写秦宣太后的骄横与坦率在当时是不大忌讳的。战国时期这几个掌权的太后也正是汉朝吕后、北魏胡太后和唐朝武则天的前导。

三.战国二百六十年间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激烈的。除了战争之外,还有外交战线的斗智。《战国策》保留的这方面史料很多,有许多是非常精彩的。例如《齐一》里面有《邯鄲之难》《南梁之难》两章,齐国君臣商讨对于前来请求援助的赵与韩如何应付,救与不救;救则须讲求策略,救的目的是什么,救到什么程度,何时救,如何救,如何出兵,走的路线及攻击点,如何等待时机,如何作战等等,非常细致周密。又如东周、西周、宋、卫、中山诸策所载小国如何与强国周

旋,不但自保平安,有时还敢从大国方面捞到便宜。这些很能给弱小国家增长志气。西汉刘向《校战国策书录》所说的“转危为安,运亡为存”,主要就是诸侯国的外交策略问题。宋代以来,提到《战国策》就把智谋一概骂倒,都称谲诈,这未免太过分了,似宜区别对待。外交策略上面的智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,怎么能够痛诋之为诡计呢?而上文所引王廷相的话“蓄狙诈以交外”,恰好正是这种迂腐论调。孙武及孙臆的兵法,受到全世界的重视,不但用于军事,而且用于其他方面,例如企业管理,人人尽知其为中国光辉的文化遗产,人人尽知宋襄公“不鼓不成列”之愚蠢可笑。为什么?因为战略战术的得失能够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。那么,《战国策》这些讨论外交策略的史料在今天恐怕仍有可以总结、可以借鉴、可以启发思考的地方吧。

从刘向起,历代有识之士都欣赏《战国策》的文采。就是在今天,若干选篇,例如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(《齐一·邹忌修八尺有馀》)《冯谖客孟尝君》(《齐四·齐人有冯谖者》)《庄辛谏楚襄王》(见《楚四》)《鲁仲连义不帝秦》(《赵三·秦围赵之邯郸》)《触龙说赵太后》(《赵四·赵太后新用事》)等等也早已广泛流传鉴赏,还进入学校的课堂。至于把《战国策》的许多故事改写为儿童读物,收入成语典故的各种工具书,影响深远,更不必说。从文学的角度看,虽然《战国策》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,篇章也参差不齐,而在总体上,文章的思路宽广活泼,细致周密,逻辑性较强,针对性更强,犹如磁铁,吸住对方不放,以言辞打动对方,使对方听信。古希腊罗马讲究在公共场所讲演抓住听众的艺术,古代中国,在《尚书》里面留下一些演讲的篇章,数量不多,中国讲究的是使用对话形式游说的艺术。这在周朝的历史文献中已经显示出来,著名人物,尤其是先秦诸子,无一不是能说会道的,或成本大套,或零金碎玉,精辟深刻,引人入胜。《战国策》所记的纵横家游说之士也是如此,差异只在于思想内容往往多尚功利而已。由于战乱连绵,纵横家的游说之辞,再也不是《左传》《国语》那种温文儒雅,含蓄悠闲的风格,而是简明爽朗,口语化的,带有煽惑意图的说辞。通常是单刀直入,一针见血。即使迂回婉转,用意仍是吸引对方,使自己的游说成功。许多优秀篇章,叙事生动形象,文字简练,篇幅不长,却是结构严谨完整,寓意深刻而又富于情趣的故事。注意文采,刻画人物栩栩如生,各人有各自的鲜明性格。在典型环境中,人物的处境、身份、性格特点、活动意图、言行等等都跃然纸上。人物写活了,至于善恶美丑,是非

得失,功绩成败,作者都留与后人评说。游说之辞则铺张扬厉,洋洋洒洒,犹如不押韵的楚辞汉赋。历史叙事则惜墨如金,点到即止,确是史家笔法,决不拖泥带水。《战国策》与先秦诸子一样,善用比喻、夸张、排比、骈偶等等修辞手法。常借助于故事寓言来映衬话题,而它们早已成为童叟皆知的谈助,如狡兔三窟、狐假虎威、画蛇添足、惊弓之鸟、鹬蚌相争、南辕北辙等。今日俯拾皆是精练的词语,许多也出于《战国策》,如:争论、满意、中立、虚名、四分五裂、百发百中、趾高气扬、前功尽弃等。《战国策》自身也有或引用一些至理名言,例如:“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”“故《老子》曰:‘圣人无积,既以为人,己愈有;既以与人,己愈多。’”

《战国策》的语言艺术之中,有一件稀奇而又被人们忽略了创造,借用今日曲艺表演的说法,叫它“一赶二”。《中山·中山与燕赵为王》章,张登与蓝诸君的对话既是二人对答,又让蓝诸君扮演齐王来听张登的说辞。非常活泼,又比较复杂。话里套着话,现代标点必须使用到第三层的引号。《燕二·苏秦说奉阳君合燕于赵以伐齐》章也是如此。这在别的书里却是罕见。远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有这样的文章,确实是难得。在古典戏曲中偶一为之,不易精彩。京剧老戏《开山府》(亦名《打严嵩》)为著名演员马连良、裘盛戎珠联璧合的拿手好戏而后继乏人,这出戏的语言艺术采用类似《战国策》这个手法而又更加扩展,而且在戏里同一套对话能够连着表演三次(其他的戏多为两次),台词照旧而表演效果越来越精彩,成为京剧独放异彩的一绝。而这手法的嫩芽却保留在《战国策》之中。

《战国策》对于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。楚、汉之际有蒯通,西汉初年有邹阳、主父偃等,虽然擅长纵横之术,无所用之。天下已归一统,游说雄辩主要采用策论及奏议疏表之类的形式,上奏皇帝。于是贾谊、晁错等应运而生,其文采直承纵横家,打动人主以求任用则同于游说之士。汉赋之铺陈夸饰,固然出于屈、宋,也带有游说的色彩。司马迁《刺客列传》记载荆轲事迹,笔锋饱含感情,为名家名篇之一。后人去其首尾,补入《燕三》,竟然水乳交融。再晚的文学家继承古典散文传统,显然受了《战国策》较大影响的,北宋有苏氏父子,南宋有陈亮(陈亮还受到贾谊的感染)。苏洵最为明显,就是苏轼,若干篇散文雄辩滔滔,锋芒毕露,既有纵横家的声势,也有《孟子》“吾岂好辩”的影响。后人所辑《东坡志林》的史论,既有较高的见解,又有敏锐洗练的文笔,潇洒豁达,也显示出他把《战国策》升华了之后的神采。

把《战国策》作为战国重要史料,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,在今天是没有人再反对了。可是这部书的价值到底如何?

刘向是儒家的忠实信奉者,他编写《列女传》所用的精力,所表现的热忱,远超过他为《战国策》所付出的。他从圣贤“教化”的标准出发,否定了《战国策》而肯定了《列女传》,因为《战国策》是“不可以临‘教化’”的(《校战国策书录》)。曾巩整理几乎散失的《战国策》,目的是“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,然后以禁则齐;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,然后以戒则明”(《战国策目录序》)。刘向、曾巩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历代士大夫的矛盾心理状态,对于《战国策》既欣赏其文采,又害怕这一“邪说”;既想扑灭这非正道的野火,又知道此书是毁不掉的。

《战国策》暴露诸侯国的统治者之昏庸愚昧,荒淫无耻,残忍暴虐,骄横自负,种种丑恶被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国王太后中的比较英明者只是凤毛麟角。诸侯的后妃男宠亲戚佞信大臣豪门,相互倾轧,不择手段,勾心斗角,你死我活,种种丑恶比比皆是。这些事例在《战国策》中是不胜枚举的。每个诸侯国里,上上下下,一片黑暗,污秽不堪。《战国策》还揭露当时社会的庸俗心理,羡慕权势地位荣华富贵,借苏秦与嫂之问答,慨叹世态炎凉。也描写了若干事例,为了金钱,什么伤天害理出卖国家的事都干得出来,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:秦国用金钱买动赵王的宠臣做内奸使赵王杀死李牧以亡赵国的事(《赵四·秦使王翦攻赵》章与《秦五·文信侯出走》章,后者写得极为冷酷)。商人吕不韦认为:耕田获利不过十倍,贩卖珠宝获利百倍,“定主立国”这宗买卖所获之利是无法计算的。吕不韦就做这笔大生意而获无穷之利(《秦五·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》章)。当然,在战国人欲横流时期也有逆潮流而动者,例如鲁仲连就认为“所贵于天下之士者,为人排患、释难、解纷乱而无所取也”。《战国策》着实用力宣传“士”之可贵,也描写了若干个“士”的骨头是硬的,品德是高的。游说之士多次指斥国王的儿子、亲戚、男宠、亲信等人“位尊而无功,奉厚而无劳”。连赵威后也认识到“民”(那时的涵义与今天有区别)的重要地位。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。《战国策》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社会情况和思想情况是非常复杂的,这部书能够把这样复杂的历史事实记载得清清楚楚,活灵活现,它的价值当然很高,不容怀疑。过去以儒家思想为正统,把《战国策》骂倒,并不是不知道《战国策》里也有类似儒家“士不可不弘毅”、“民为贵,君为轻”的思想,但仍然要骂倒《战国策》,因为《战国策》所揭露的统治阶级的丑恶现象太多也太深刻了。因而一面骂它,一面又欣赏它,这是很奇特的。近代曾

有人说《战国策》“大半是小说”。中国文学史上曾有清末的谴责小说如《官场现形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。就算《战国策》是小说吧，所写的场面之大，格局之复杂，笔墨之生动活泼、简练、深刻，非谴责小说所能望其项背。所以《战国策》这书，无论把它作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来看，或是把它当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来看，它都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《战国策》的流传也曾遭厄运。

刘向在皇宫里的书库看到战国时期到楚汉之际纵横家书若干种编本，认为它们“错乱相糅莠”，于是综合各本，编为三十三篇，分别归到十二国；每国之中的材料又“略以时次之”；校定文字脱误，把这个新编本定名为《战国策》。这就是最早的定本。

由于这些材料错乱复杂，刘向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，仍然不免有疏忽的地方。例如《韩一》里《王曰向也子曰天下无道》《或谓魏王》《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》三章均应归到《楚策》。还有一些篇章的内容大致相同，只是字句互有详略，这可能是刘向兼收并蓄的结果，也许是刘向校录时所谓“除复重”的工作搞得不够彻底。此外，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说辞，其中有真有假，有虚有实。刘向去战国不算太远，或许疏解得更多一些。可惜他不太重视，未置一辞。当然，从具体工作来讲，刘向确实很不容易。例如《赵二》所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辩论言辞，就多与《商君书·更法》相同或近似；《秦一·张仪说秦王》章与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基本上一样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春秋家”收录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，就是刘向校录编定的本子。

东汉末年，延笃（？~167年）字叔坚，给《战国策》作注释，还写了一卷评论，均已亡佚。南宋姚宏《战国策续注》引用过。

东汉末年，高诱（生卒年未详）在给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作注释之外，也注过《战国策》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刘向校录和高诱注释的《战国策》就散失了。

在刘向编辑《战国策》所淘汰的当时流传的战国纵横家书若干种的若干篇章，后代曾有人引用。刘向定本《战国策》曾经散失，后代也有人引用。因此徐广、司马贞注《史记》，李善注《文选》，还有一些类书如《北堂书钞》《艺文类聚》

《太平御览》等及其他书籍所引用的《战国策》，或与今日流传的本子字句有差异，或为今本所无。清代王仁俊曾辑录《战国策佚文》一卷，收入所辑《经籍佚文》之中。诸祖耿于1940年修订旧作成《战国策逸文考》（收入所著《战国策集注汇考》，1985年），辑得逸文七十二条，又附一条，论证甚详。

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共二十七章，十六章全然不见于今传本《战国策》，十一章文字有差异。

《战国策》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以后的正史与私家书目中均著录，但篇数有出入。可以看出原书已有散失。据《崇文总目》所载，正文原三十三篇那时已缺少了十一篇，高诱注原二十篇那时只剩下八篇。

经过北宋曾巩的努力搜求，才得恢复到刘向三十三篇的数目，恐怕不见得能够搜求到已遗失的十一篇全部。显而易见的便是《燕三·燕太子丹质于秦》章乃是后人在《战国策》残缺之后，抄《史记·刺客列传·荆轲》来补的。曾巩搜求高诱注得十篇，即第二至四，第六至十，第三十二、三十三卷的注释。

曾巩所编的本子比较完备，流传下来。

在北宋时还有：集贤院本、刘敞（字原父）本、钱藻本、（苏）东坡本、苏颂本、李格非（字文叔）本、孙朴（字元忠）本、孙固本、孙觉本等。这些本子以及后来的晁以道本等早已亡佚，只知道曾本、钱本、刘本、集本的文字互有异同，刘本缺第三十一至三十三卷，钱本缺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卷，集本第二十一卷与众完全不同，东坡本与曾本基本相同。

南宋初年，《战国策》有一些刻本，都不甚精。绍兴十六年（1147年）浙江剡川人姚宏访求善本加以校定，重刻《战国策》。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刊本。它避宋太祖赵匡胤的“匡”字、宋钦宗赵桓的“桓”字、宋高宗赵构的“构”字、孔丘的“丘”字，确为宋高宗时的刊本。这书的骑缝处都刻上工匠的姓名，这是记载古代木刻艺术家的资料。

姚宏还把高诱注的二十三篇，即第一、第五、第十一至三十一，重新作了补注，在注文的前面加个“续”或“续云”以示区别于高诱旧注。姚宏又校勘曾、刘、钱、集、东坡等本的文字差异作了一些校记。可见姚宏比较严谨。但是明朝毛晋汲古阁翻刻姚本，竟然在每卷开头都题“高诱注”，这样一来就混淆了高诱注与姚宏续注，会使读者搞错，这是很不严肃的。

一年之后，南宋鲍彪刊出他的《战国策注》十卷，调整策文次序，并改定本文，

或改字,或增或删。

两宋各家的本子有共同的一点,即用力于校勘《战国策》各种抄本刻本,而罗列其文字异同,以供采择,不加按断。姚宏则已开始注意到运用《史记》等书与《战国策》作比较,而且提到遗佚的策文问题。同乡会稽姚宽也注意到这些方面。

元朝至正乙巳(1365年)吴师道刊《战国策校注》十卷,重校此书,补正鲍彪注本。吴已认真地利用《史记》等书来研究《战国策》,他不赞成鲍彪的擅自增删改动。

清朝嘉庆八年癸亥(1803年),江苏吴县黄丕烈根据姚宏本重刻,并写了《战国策札记》三卷,详列鲍彪本、吴师道补正本之异同,参考《史记》等书,以校订姚本本文,加以判断。还采录了同时代的段玉裁、顾广圻等人的某些说法。

王念孙(1744年~1832年)参考与《战国策》有关的资料,运用古文字音韵训诂知识,加以校勘,撰《战国策杂志》三卷,收在他的《读书杂志》中。对于今本《战国策》文字讹误之处多所匡正。精到之处,超过前人。例如“讐”字,罕见,不知其正确音读,也不知其来历。只因《赵四》用了它,没有人提过疑问。王念孙提出它是“龙言”两个字误写到一起。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出土,证明王念孙的判断正确。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校勘别的古籍也往往引用《战国策》而一同校正,这也附带解决了《战国策》文字讹误的问题。

《战国策》有不少地方历来难读。

它的难读,有时是由于我们对于当时的历史、地理、社会、文化等等情况不够熟悉,对于古代汉语的语音结构某些方面未能掌握,还可能有其他原因。例如把《战国策》里的古国名东周、西周误解为通常用的历史朝代名,又如“乃效煮枣”,效是奉献,煮枣是魏国古邑名,魏国还有个地名叫酸枣。

《战国策》难懂,更主要的原因是此书曾经散失,历代传抄刊刻往往出错。

或者写错了字,旧称“讹”、“误”。或者抄漏了字,旧称“缺”、“脱文”;有时像是文章的省略,其实是抄漏了若干字。或者抄写颠倒了字,旧称“误倒”。或者抄写误增而重复了字甚至多出了不相干的字,旧称“衍文”、“衍”。或者出现“错简”,古代抄书用竹简,竹简每简写若干字,竹简必须按次序编捆在一起,不能散乱。否则这篇文章就会有若干字的“缺”、“脱”、“衍”和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。

黄丕烈《战国策札记》指出《战国策》上述的在文字上讹误的有一千几百条,

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校定《战国策》文字讹误的论证就有三卷，还不包括王氏校定别的古籍文字讹误而涉及《战国策》的部分。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的出土，不但提供了战国的久已失传的一些史实，也为校勘今本《战国策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《战国策》本文讹误脱衍等等需要校勘补正之处如此之多，所以此书历来难读。汉朝刘向早就说它“错乱相糅莠”。北宋李格非说它“舛错不可疾读”。曾巩说它难懂，因而他曾“正其谬谬而疑其不可考者”。孙朴说“此书舛误特多，率一岁再三读，略以意属之而已”。南宋姚宏说它“舛误尤不可读”。姚宏给它作注，遇到实在无法下笔时只好说，这里“盖讹谬，当用《史记》全篇观之”。元朝吴师道说“此章多难通，此类尤难知”，“语不可晓，有缺误”，“语不可解，疑有舛误”，“未详”。清黄丕烈也常说“此策文有誤字”。

不但《战国策》正文如此，就是汉朝高诱注、南宋姚宏续注、清朝黄丕烈《札记》，也有文字讹误和费解的地方，未经校正。注家还有一些过于求简的省略说法，例如“韩炉炭”，意思是说：这两个字在《韩非子》里面写作“炉炭”。

旧时注释本的《战国策》确实不易读。

近百年来，历史学家、文字音韵训诂学家人才辈出，考古发掘亦多所发现，《战国策》之研究整理就走上了新阶段。这方面的进展，这里从略。

可以预见，《战国策》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其特殊光彩。

关于标点我们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。例如：《楚四·天下合从》章谈到惊弓之鸟，“然则射可至此乎”出现两次，我们给第一次的这句话加疑问号，表示魏王不信。给第二次的这句话加感叹号，表示魏王惊奇赞赏。又如《秦三·范雎至》章，我们体会范雎是“远交近攻”策略的首创者，决不会对近邻妥协，所以标点为：“卑辞重币以事之？不可；削地而赂之？不可；举兵而伐之！”两个问号表示思考，两个分号（不用句号）表示语气紧迫，感叹号表示神情慷慨，坚决不允许多变的近邻魏国张牙舞爪。这样回答秦王，才能打动秦王。

关于注释古籍，我自己是比较谨慎的。读《战国策》虽也有一些体会，还很肤浅，拿不出手。若干年后，酝酿成熟，再以札记形式向专家求教吧。目前只是随时提醒自己以下几件事：

第一，上古音韵关系不是万能的，音义通转的处理，不可不慎！

例如《楚四·虞卿谓春申君》章有“于安思危”。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第二十三章、《逸周书·程典》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又《直谏》均用“于安思危”。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用“居安思危”。如果说“于安思危”、“居安思危”意思基本一样,可以说“于安”是介宾结构,“居安”是动宾结构;说介词多由动词虚化而来,说“居安”是居于安……都可以。但无论如何,不论从语言、词义、语法哪个方面看,“于”、“居”是有区别的。人的语言表达同一思想、同一事物、同一行动,可以使用多种表达方式、多种结构,不必强求只能使用一种。如果以“于”、“居”的上古音韵关系比较密切,“于”就是“居”,这就不妥。

第二,虚词所起的作用十分细致微妙,务必认真分析掂量。不宜只凭借上下文,就主观地搭桥过河,捷径通幽。

例如《楚一·张仪相秦》章:“陈轸夏人也,习于三晋之事,故逐之,则楚无谋臣矣。今君能用楚之众,故亦逐之,则楚众不用矣。”这里的两个“故”,都是说因此之故、所以。文字本来是通畅的。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人们所谓“意合法”,不必尽用虚词,借助于文章各句中的结构,分句的先后次序等手段,达到使读者理解的目的。因此这里实际上使读者理解到的是:“如果因为这种原故所以”,但这“如果”是不出现的。倘若不这样去理解,而认为“故”犹“若”也,这是不妥的。

第三,文艺性的笔墨,重在生动简练,有时闪转腾挪,避免平铺直叙,与训诂考证之文有所不同。

例如《东周·温人之周》章,同时有几种本子:“周不纳,问曰:‘客耶?’对曰:‘主人也。’”此本最通顺。还有“周不纳,客即对曰:‘主人也。’”及“周不纳,对曰:‘主人也。’”和“周不纳,即对曰:‘主人也。’”等其他抄本之差异。争论其是非,太过则如同焚琴煮鹤了。

先生对古文今译的历史也曾有清晰的阐述,对翻译工作所谓“信、达、雅”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,也深知其中的艰辛。先生在《战国策全译·序》(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4年)中说:

对于古籍今译,近年以来曾初步展开讨论。我赞同某些意见,例如:今译不能代替原作。我也认为严复“信、达、雅”是外语译为汉语的经验总结。但自己也有一些想法。

第一,古籍今译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去理解原作,而不是去代替原作。因此《战国策全译》不但努力试图表达原意不走样,而且表达的方式也尽可能紧跟原文,有时几乎接近了直译。译文使用现代语体,力求规范,让读者能看懂。译文基本上是朴素的,不勉强追求文采华丽。

第二,严复(1853年~1921年)《天演论译例言》(1897年)说:“译事三难:信、达、雅。”他所提出的这三条标准乃是就两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来说的。他这“三字诀”影响极大,搞汉外翻译工作的称引它,讨论古籍今译的也赞同它。至于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,称引者、赞同者(乃至反对者!)并不深究。若死者地下有知,严复要笑破肚皮的。严复所谓“信”,是精通原著的语言,深入钻研过原著的内容而且融会贯通,得于心而应于手。严复所谓“达”,是译者以最佳的方式(甚至改换原著的原话和例证)使读者懂得原著的意思。严复所谓“雅”,乃是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”。在严复译《天演论》出版之后,桐城派清末的重要人物吴汝纶赞扬译文“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”,严复就更加得意,以后的译作越发古奥。梁启超劝他“改从通俗”,其实梁只建议严使用浅易的新文言文而已,严在《与梁启超论所译(原富)书》(按:《原富》的译者是严而不是梁,此处“所”用得模糊)坚决拒绝。梁也坦率地指出严复搞错了翻译的大方向,梁认为“著译之业,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。”后来鲁迅《二心集·关于翻译的通信》对于严复提出更深刻的批评。看起来严译的大病正在于他对所谓“雅”的执著追求,迷途难返。《天演论》严译本出版至今将近一百年,现代的人若认为严复是把“信”解释为忠实于原著,这是首要的;“达”是译文通顺,使读者看得懂;“雅”是规范化的“雅言”,典雅有文采……云云,即把这三项看做翻译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要点,那么,这乃是现代人的理解,与严复的原意有较大的出入(关于严复的“信”和“达”,见下文“第三”部分)。

同时也可以看出,严复之“雅”乃是把非汉语的原著译为汉文,而译文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”,雅到与周秦诸子不相上下,严复后来还力求更古更深奥,那么,严复所谈的译事,绝对不是古籍今译。古籍今译也不必称引严复为同道,只能借鉴某些可取的经验。

第三,严复译《天演论》,译文轰动一时。它之所以成功,一是译成跟周秦诸子一样的文笔,二是不拘泥于“信”,采取偏重意译,甚至更灵活的表达法。在《天演论译例言》里,自称“不斤斤于字比句次”,“时有所颠倒附益”,这当然违反了他

倡导的“信”的原则，“实非正法”。这种译文，只要读者熟悉周秦古文，看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的第一段，真是引人入胜。再一看1971年3月“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翻译组”的新译本，严复译文所给予人们浮想联翩的境界全都化为乌有。严复后来译《名学浅说》，那种意译就更加自由开阔，连原著的例证都可以“引喻举例多用己意更易”。这样大开闸门的翻译，已经基本上变为选取原著某些要点，不拘一格，自由自在地重新创作了。以致严复也不得不把“译”改为“达旨”了。这在严复是完全可以的，因为他本人精通英语，学习社会科学，所译的原著都是他深入研究过的，他还有自己的评论发挥。看他的译著就好像在听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在讲学。林纾(1852年~1924年)虽然自己不懂外文，他与懂外文的人合作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光里，译出世界各国183种小说，共1200万字(文言文)。所译《茶花女》感动了许多读者。

如何看待这种翻译，是另一回事。我们这本《战国策全译》可不能这样做。上文“第一”部分已经把《全译》遵循的做法向读者说了，经过“第二”“第三”这两部分的说明，读者若倒回去重看一下“第一”，会能够谅解我所谈的那一百多字，语不惊人，要求却并不低，能做到做好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。如果这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典雅的文采！

上面为了说明我们搞古籍今译而涉及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这三个字，这里我也顺便“借花献佛”，借这三个字为花，说一说古籍今译之难。文言文只简捷地拈来三个字，现在就不能这样，必须清晰、准确而又简捷地用语体表达出来原著的每一个字的含义。这并不简单。就拿“雅”来说吧，到底是译成雅言？典雅？古雅？文雅？雅驯？雅致？如此种种，用哪一个？要找出带“雅”这个语素的词语就有一堆，任凭挑选。要避免带“雅”字的，那就没边儿啦。可是严复的原意，“雅”是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”，所以他是以一个“雅”抵雅言、典雅、古雅、文雅、雅驯、雅致等等一大堆。而我们今天不能这么做，必须弄清楚：到底是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，还是用上古的“雅言”？到底是雅俗共赏，还是以缙绅先生为读者对象？像这类问题，在古籍今译中，有的是，一言难尽。

第四，必须看到，我国的翻译工作，从上古到“五四”运动以前，无论是政治活动或民间往来的翻译，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，明末清初的科学技术外文的翻译，一直都是汉语与非汉语之间的翻译工作。时间长久，贡献很大，成果极多。在翻译的理论、实践、经验、方法等等方面都比较丰富而且成熟。这种翻译，历来受到

政府和民间的支持。但是,尽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,仍有无法弥补的缺陷,而大家都能体谅,不苛求,不谴责,扶持其成长达数千年而热情不减。例如鸠摩罗什(约为350年~409年)曾说:“但改梵为秦,失其藻蔚,虽得大意,殊隔文体;有似嚼饭与人,非徒失味,乃令呕秽也。”这话讲得真精辟!只要是译,不但是中外对译如此,就是古籍今译,虽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进行,不同于汉语与非汉语之间的翻译,都有鸠摩罗什所提到的这种无可奈何的怅惘。可是译者挨骂的严厉程度却有差别。

对于古籍今译的严厉监督是完全必要的。严厉程度超过对于外译汉的,也是应该的,因为古籍今译,除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去理解原作之外,还有另外的一种意义。就是要筛选出最佳的今译本,以备把它转译成其他语种的文字,把古汉语的不朽名著传播给世界,以弘扬中华文化。这一重要意义千万不能忽略。

司马迁之伟大贡献,除了诸家所举者外,我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是司马迁运用《尚书》(这在他当时也算得上是古籍了)来写五帝、夏、商、周等本纪和鲁、宋等世家的时候,对于《尚书》原文的一部分,采用了“今”译的办法,便利读者。这是一大创举。二是他创制了表格这种形式,这是世界文化史上,中国人一大发明贡献。

古籍今译这项工作,在司马迁之后,动静不大。这是由于文言文一直是我国历代通用的书面语言,直到“五四”运动,它的统治地位才被撼动。古代的教育制度、考试制度,使知识分子全力学习文言文,因此绝大多数古籍没有今译的必要。《十三经》的疏,以及像张居正(1525年~1582年)《书经直解》《四书直解》之类的用最浅显的文言文来串讲原著,很接近于今译。20世纪30年代使用“白话”“语体”搞古籍今译,已经屡见不鲜。由于质量不佳,自然淘汰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,一般读物、报纸、公文、法律条例等一律使用白话。然后古籍今译才于60年代逐渐受到重视,直到近年一度出现暂时的今译热。今译古籍计划性不强,时有撞车现象。搞今译的撰稿人水平参差不齐,译得失当,文句拖沓,脱离原文任意发挥,以及其他疵病,使读者失望。这些现象确实存在,但受到欢迎的今译还是不少。由于读者兴趣已转移到其他更为关系切身利益方面去了,出版界的今译热已经降温转趋平静,这该是比较正常的。

古籍今译这项工作,虽然可以上溯到司马迁,但那只是初见火花一闪。真正搞起来,在大陆、台湾、香港,并没有多少年。古籍今译这项工作的原则、方法、经